

唐代女性胡風服飾興衰

劉高琿

摘要

唐代女性胡風服飾主要流行於初盛唐時期，中晚唐雖仍有受吐蕃和回鶻影響的胡風服飾，但整體而言胡風影響已逐漸減弱。唐代女裝胡風服飾興衰背後更深層次的文化因素，包括對外來文化的心態、女性地位、思想、軍事等各方面因素。初盛唐時期婦女胡風和男裝盛行背後，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處於上升時期、優勢地位的唐人自信下的寬容，而中晚唐對胡風服飾的排斥則是安史之亂後自信喪失的體現。

關鍵詞

唐代女裝 胡風 唐代文化

一、緒論

《舊唐書·輿服志》、《新唐書·車服志》等史書、詩歌、筆記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傳世畫作和出土文物中保存了大量關於唐代服飾的史料。系統的服飾史研究自 20 世紀 20 年代便已開始，至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然而前輩們的研究多是針對服飾之具體形式，即使有涉及胡風興衰之背景，也多只關注到了胡風興盛的初盛唐時期的開放態度，而鮮少注意中晚唐時期對胡風的排斥態度。

埃德加·沙因（Edgar H. Schein, 1928-）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1. 人工成分，指可見的、能感覺到的體系和過程；2. 信奉的信念和價值觀，指理想、目標、價值觀和抱負等；3. 潛在的基本假設，指無意識的、理所當然的信念和價值觀，並認為一個文化的本

質在於其基本潛在假設。¹服飾屬於文化的人工成分部分，其背後滲透着文化中更深層次的部分，因此本文將結合唐代軍事思想背景，探尋唐代胡風服飾興衰背後唐代文化深層次的部分。

二、唐代女裝概說

唐代女裝主要分為襦裙服、胡服、女着男裝三種配套服飾，以下分而述之。

（一）襦裙服

襦裙服主要形式是上身着短襦或衫，下身着長裙，配披帛，此外，唐代女裝還會加配半臂。

襦與衫：與其他朝代相比，唐代部分女裝裙腰提得較高，因此上襦較短。領口常有變化，常見領口有交領、對襟等，盛唐時還流行袒領。衫較襦長，多指絲帛單衣，常見的有袒胸貫頭、對襟、右衽三種。其中袒胸貫頭式的衫裙基本不見於其他時代。這種衫沒有開襟，領口開得低，袒胸處呈雙桃型，突出了女性的形體美。這種衫有窄袖和大袖兩種形式。

裙：唐代下裙提高，有些可以掩胸，初唐時甚至可達腋下。唐代之裙一般是用六幅布帛製成，上層婦女所着有較華貴的七幅裙，此外還有更為華貴的「織成毛裙」，據《舊唐書·五行志》、《朝野僉載》等文獻記載，中宗女安樂公主曾造百鳥毛裙，計價百萬。²從色彩上看，裙色多為深紅、杏黃、絳紫、月青等，十六國時出現的條紋裙，延續到唐朝。盛唐以降，條紋裙漸少見，婦女多喜着色彩更為濃豔的裙子，更有紅綠等強烈對比色彩，如《太平廣記》記「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着紅衫綠裙」。³

帔與披帛：唐代女裝，肩部常披一塊長條形布帛，或名之曰披帛、帔子。

半臂：半臂是一種短袖上衣，出現於三國時，至隋唐已逐漸流行，中唐以後，隨着女裝日趨肥大，半臂則顯著減少。

下圖為出土於洛陽孟津西山頭唐墓身着朱紅色長裙，朱紅色帔巾的女仕俑：

¹ 參見埃德加·沙因(Edgar H. Schein)著，章凱、羅文豪等譯：《組織文化與領導力(第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21-31。

² 參見孫機：〈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載氏著：《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224-252。

³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冊，卷242〈蕭穎士傳〉，頁18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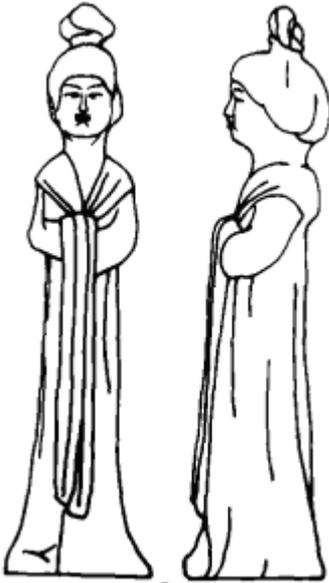


圖 1 洛陽孟津西山頭唐墓內着窄袖衫，外加半臂、披帛，下穿長裙的女仕俑⁴

（二）胡服

初唐至盛唐年間，外來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甚廣，《大唐新語》中記載，貞觀（627-649）年間金城坊為「胡」所劫，司法參軍尹伊根據當時「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⁵的情況做出正確判斷的故事，由此也可見彼時胡漢互相影響之深。

（三）男裝

女着男裝亦是唐代女子着裝特點。如《大唐新語》：「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⁶

三、唐代女裝胡風服飾之盛

（一）首服

受胡風影響較大的唐人首服有羃鬘、幘帽和胡帽。

⁴ 310 國道孟津考古隊：〈洛陽孟津西山頭唐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年第1期，頁52-68。

⁵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38。

⁶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頁151。

《舊唐書·輿服志》記載「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着羃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高宗年間曾以「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下敕禁止，但收效甚微，「則天之後，帷帽大行，羃羅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羃羅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⁷

高宗武后時，羃羅被幃帽替代。幃帽同樣發自戎夷，承自齊、隋，是一種帽檐下垂一圈到頸部的紗網以將面部遮住的席帽，帽下垂網多以皂紗製作。⁸理論上，幃帽下垂紗網，依舊可以遮蔽五官，然而據吐魯番阿斯塔那第 187 號墓出土的唐俑等文物可看出，「大多數的紗網是從面頰兩旁向後撩的，面部的主體是露在外面的」。⁹



圖 2 吐魯番阿斯塔那第 187 號墓出土的唐俑¹⁰

幃帽之後，開元（713-741）初年，婦人騎馬所穿的首服則成了「胡帽」。

（二）妝容

白居易〈時世妝〉一詩中，對當時流行的「時世妝」進行了描寫：

⁷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5〈輿服志〉，頁 1957。

⁸ 周峰：《中國古代服裝參考資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頁 50。

⁹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

¹⁰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彩繪騎馬戴帷帽仕女俑，〈http://zhuanti.cpon.cn/bwgzt/product_content-5.asp?bh=5&sh=&id=1399〉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8 日]。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
 時世流行無遠近，顯不施朱面無粉。
 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
 妍蚩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
 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
 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
 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¹¹

白居易詩中所寫與《新唐書·五行志》所記載的「元和末，婦人為圓鬟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狀似悲啼者。圓鬟者，上不自樹也；悲啼者，憂恤象也。」¹²相符，由此可知，赭面烏唇八字低眉的女性妝容在漢地繁華之處頗為流行。《新唐書·吐蕃上》記載吐蕃「以赭塗面為好」，而文成公主入藏後「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¹³雖然赭面習俗在吐蕃並未就此禁斷，但亦可知初唐漢人並不欣賞此風俗。到了元和（806-820）年間，這種來自吐蕃的妝容在中原漢地卻蔚然成風。

（三）身服

1. 襦裙服中的胡風

（1）窄衣小袖

傳統漢人衣冠多較為寬大，與此相對，胡風服飾以窄小為特徵，《新唐書·五行志》中，具體描寫了這一特徵：如「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¹⁴白居易〈上陽白髮人〉中，也用「小頭鞦履窄衣裳」¹⁵描述天寶（741-756）末年流行的服裝。出土文物也可與詩文相應證明：

¹¹ 謝思煒撰：《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1冊，頁402-403。

¹²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34〈五行志一〉，頁879。

¹³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16〈吐蕃傳上〉，頁6072。

¹⁴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34〈五行志一〉，頁879。

¹⁵ 謝思煒撰：《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頁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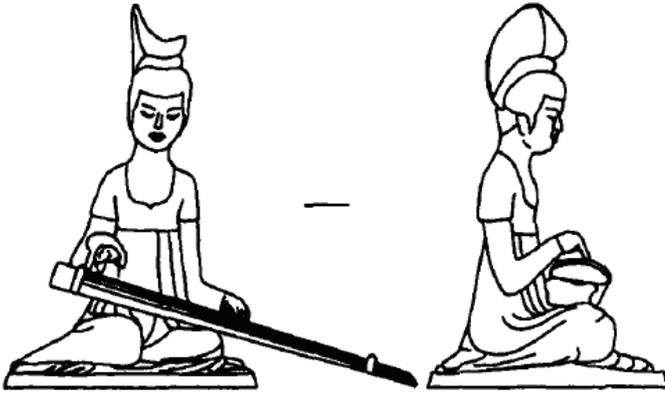


圖 3 遼寧朝陽紡織廠唐墓中出土的女撫琴俑便着窄袖襦裙¹⁶

高宗（李治，628-683，649-683 在位）、武后（武曌 624-705，690-705 在位）時期的山東莘縣黃廟張弘墓中的女騎馬俑亦着窄袖長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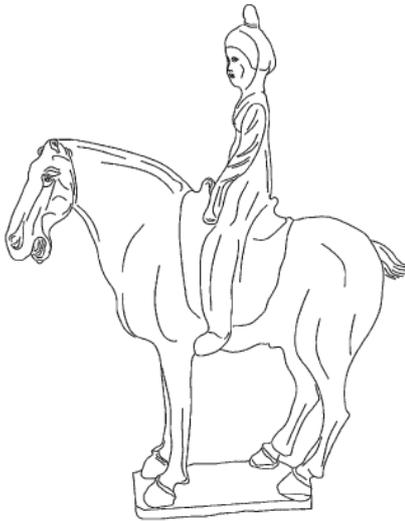


圖 4 山東莘縣黃廟張弘墓中的女騎馬俑¹⁷

¹⁶ 朝陽市博物館：〈朝陽紡織廠唐墓發掘簡報〉，《邊疆考古研究》第 8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379。

¹⁷ 李洪冰：〈山東莘縣黃廟唐代張弘墓發掘簡報〉，《文物》2017 年第 4 期，頁 17。

(2) 領形

受胡人影響，唐人女裝中出現袒胸／圓領式服飾。〈內家嬌〉詞對這種袒胸式服裝有所描述：「絲碧羅冠，搔頭墜髻鬢，寶裝玉鳳金蟬。輕輕傅粉，深深長畫眉綠，雪散胸前。……渾身掛異種羅裳，更熏龍腦香煙。」¹⁸段文傑在《莫高窟唐代藝術服飾》中將莫高窟三二九窟女供養人的服飾描述為「圓領露胸，袖長至腕，長裙裹腳，『椎髻孤標』，披透明的紗巾」，並認為這種新裝來自西域胡服。¹⁹

出土文物亦可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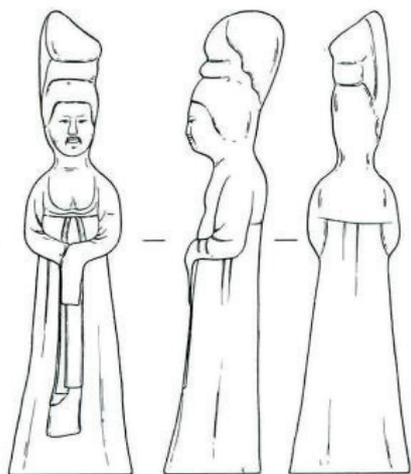


圖 5 故高陽郡君許氏夫人墓（唐高宗早期）中身袒胸窄袖襦衫的女立俑²⁰

雖然在詩詞的描寫中常見着這種服飾的女性酥胸半露，但是從唐墓壁畫看，並不是所有女性着袒胸／圓領襦裙時都會露出雪胸：如貞觀十四年（640）楊溫墓中七仕女圖和貞觀十七年（643）長樂公主墓的四女侍圖中的女性形象即未露胸。²¹可見初盛唐時期雖出現了露出胸部的女裝，但並非人人皆露，亦沒有證據表明其流程度超過其他服飾。

¹⁸ 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撰：《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正編卷 4 〈敦煌詞〉，頁 814。

¹⁹ 段文傑：《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頁 280。

²⁰ 楊軍凱、辛龍、張振鵬、孟博、寧琰、黨曉婷：〈唐代故高陽郡君許氏夫人墓發掘簡報〉，《文博》2014 年第 6 期，頁 11。

²¹ 張志攀主編，陳志謙、陳瑤撰稿，昭陵博物館編：《昭陵唐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35、37。



圖 6 楊溫墓中七仕女圖²²



圖 7 長樂公主墓的四女侍圖²³

2. 女着男裝中的胡服影響

²² 張志攀主編，陳志謙、陳瑤撰稿，昭陵博物館編：《昭陵唐墓壁畫》，頁 35。

²³ 張志攀主編，陳志謙、陳瑤撰稿，昭陵博物館編：《昭陵唐墓壁畫》，頁 37。

關於女着男裝的流行時間，周峰認為，唐朝女着男裝與胡服是同時流行的。²⁴ 榮新江〈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一文也指出，女着男裝的現象在貞觀年間便已出現，在同一個墓葬的侍女形象中，從初唐到盛唐，男裝比例雖未超過一半，但是卻逐漸增大，至天寶後則不復存在。²⁵

胡服中男女裝束界限不甚明顯，甚至有些款式本為男女通用。而唐代女子所服男裝，則多與男子無異，着裝窄袖圓領缺胯衫。

雖然唐代出現了着男裝的宮人，但是孫機根據唐永泰公主墓石槨線刻、唐章懷太子墓石槨線刻等唐墓中的壁畫和線刻畫指出，畫中都是着裙衫者居前，着男裝的「袍袴」手捧器物隨從於後，其身分顯然較低。²⁶

3. 舞者服飾

藝術上，唐代也是外來音樂舞蹈傳入中原的高峰期，舞者的服飾也隨着胡樂胡舞進入大唐。

唐代音樂可分為雅樂、胡樂、俗樂。初唐時期，唐太宗（李世民，599-649，626-649 在位）雖重禮樂，卻沒有對其餘音樂加以過多限制，因此胡樂有較好的發展空間。唐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 在位）時期將樂分為「立部伎」、「坐部伎」二部，據楊旻璋考證，立部伎八部，都雜有西域音樂；²⁷而坐部伎六部，根據《新唐書·禮樂志》記載，只有「龍池樂」沒有採用龜茲樂。²⁸隨胡樂胡舞進入中原的還有舞者的服飾，這些舞者服飾大多直取胡服原式，不加修改。

4. 回鶻服

安史之亂時，唐朝曾借助回鶻力量平亂，嗣後回鶻居長安者日眾，其服飾也對漢人服飾產生較大影響。回鶻裝流行於中晚唐，「其制為翻領長袍，寬下擺，窄袖，衣身寬大曳地，喜用紅色暖色系的織錦，頭再梳回鶻髻，戴鳳鳥金冠，足穿翹頭軟線鞋」。²⁹

綜上，唐朝流行之胡風服飾可大致總結如下表：

²⁴ 周峰：《中國古代服裝參考資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頁 54。

²⁵ 榮新江：《隋唐長安 性別、記憶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36-37。

²⁶ 孫機：〈唐代之女子着男裝與胡服〉，《藝術設計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27。

²⁷ 楊旻璋：《唐代音樂文化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256。

²⁸ 原文：「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惟龍池則否。」見（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22〈禮樂志十二〉，頁 475。

²⁹ 王紹軍：〈唐代婦女服飾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頁 46。

時間	服飾流行情況	背景
初盛唐時期	窄衣小袖 出現袒露胸部的襦裙 女着男裝較多	貞觀之治至開元盛世年間 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發達之時
中晚唐時期	胡妝、時世妝	安史之亂後唐朝丟失西北大片疆域，唐與吐蕃邊境距長安城僅五百里
中晚唐時期	回鶻妝	安史之亂唐朝借回鶻兵平亂嗣後回鶻人留在唐朝

表 1 唐朝流行之胡風服飾

四、唐代女裝胡風服飾之衰

（一）襦裙裝變化

上文已論述，相比較漢人服飾，從時間變化上看，初唐時期女子服裝以小袖長裙為主，至於中晚唐，女裝則漸次寬大，胡風影響減弱，趨向漢魏舊制。

（二）女着男裝的變化

中晚唐女着男裝現象也逐漸稀少。前節所引榮新江〈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一文中的統計表明，安史之亂前，女着男裝比例逐漸增多，但亦指出，天寶之後女扮男裝現象雖然仍出現在文獻中，卻已經不見於考古資料。³⁰

（三）胡妝遭到排斥

上文所引白居易〈時世妝〉一詩中，斥責這種胡妝「妍蚩黑白失本態」、「髻堆面赭非華風」，而《新唐書·五行志》也以其為「憂恤象」，可見中晚唐之後的士人對於這種妝容頗為不滿。

（四）胡風與女着男裝被看作「服妖」

《舊唐書·五行志》關於服飾的部分只有涉及安樂公主「百鳥毛裙」等奢華服飾的寥寥數條，並無關於胡服、女着男裝的條目，而這類現象，在《新唐書》中則已被歸為服妖。

³⁰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37。

如關於羃鬮與幃帽的記錄，《舊唐書·輿服志》只作為普通的記載，³¹而《新唐書》中則被視為服妖，預兆婦女干政：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着羃鬮，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幃帽，施裙及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羃鬮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³²

《新唐書》中「全身障蔽」的「羃鬮」被露出身體更多部分的「幃帽」替代，被看作女性干政的預兆，然而《舊唐書》中對此並無嚴厲批評，作為記載對象的初盛唐時期對此更是不以為意。

對於胡風胡服，從唐初修撰的《晉書》、《隋書》到易代後的《兩唐書》，都有將之視為服妖或日後與胡人有關的災難性徵兆。

在《新唐書·車服志》中，關於開元年間「士女衣胡服」的記載與「服妖」相聯繫：

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鞞。開元中，初有線鞋，侍兒則着履，奴婢服襪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³³

《舊唐書·輿服志》中，同樣有關於這種情況的記載，雖然沒有直接斥責其為「服妖」，但也將其與安史之亂相關聯：

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³⁴

初唐貞觀時期修撰了魏晉南北朝的史書，其中，《晉書》、《隋書》有《五行志》，兩書中服妖部分都有胡服相關記載，可反映初唐時期對胡風的態度：

³¹ 原文：「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着羃鬮。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幃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尋下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幃帽，遂棄羃鬮，曾不乘車，別坐簷子。遞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馳駕車，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並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則天之後，幃帽大行，羃鬮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羃鬮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幃帽之制，絕不行用。」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45〈輿服志〉，頁 1957。

³²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34〈五行志一〉，頁 878。

³³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24〈車服志〉，頁 531。

³⁴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45〈輿服志〉，頁 1958。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貂裘，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為紒頭及絡帶袴口。……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³⁵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³⁶

《晉書》中，泰始（265-274）、太康年間（280-290）胡風盛行與後來氐羌互反、劉、石篡中都相關；《隋書》中則以齊文宣帝（高洋，526-559，550-559 在位）施粉黛、着胡服為齊亡的徵兆。可見，在初唐人眼中，胡服亦與日後少數民族南下、中原板蕩或齊國滅亡相關。這種將胡風服飾盛行與災難後果相聯繫的思維與晚唐五代以及宋朝其實並無太大差別，但初唐並未因此排斥外來事物，反而繼承了北朝對胡風開放的態度，以至發展至盛唐時期，仕女着胡服成為了唐朝女裝的一個特點。

五、唐朝女性胡風服飾興衰探因

（一）對待外來事物的態度

如上文所述，初唐修撰的兩部史書都將胡風胡服與前代衰亡相聯繫，但是初唐人卻並沒有因此排斥外來事物。《貞觀政要》中還記載唐太宗對隋煬帝（楊廣，569-618，604-618 在位）過度在意胡人的批評：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³⁷

可見其對待外來事物的大度包容。唐代對外採取「懷柔」的民族政策，用設置羈縻州、不徵稅賦等方式加以籠絡。在此背景下，初盛唐時期外來人口眾多，物質繁盛。初盛唐時期胡服興盛正是此時期對待外來事物態度開放的體現。

初唐胡風之盛，甚至唐太宗長子李承乾（619-645）還在宮內學習胡人做派：

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斃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

³⁵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7〈五行志上〉，頁823-824。

³⁶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2〈五行志上〉，頁629。

³⁷ （唐）吳兢：《貞觀政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頁255。

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為妖。³⁸

此事例一方面說明了初唐胡風興盛，另一方面也表明，彼時唐人對待外來事物的態度是「接受」而非「崇尚」。此時李承乾仍是唐朝的太子，身為太子卻扮突厥可汗之事說明初唐胡風滲透之廣，但另一方面，此時承乾太子與父親關係已經惡化，此後太宗還嘉獎了撰《諫苑》諷承乾的于志寧（588-665）。³⁹承乾太子仿效胡風被左右視之「以為妖」，可見初唐時期人們並不期待一個好胡風、以胡為貴的太子。

對比李世民、李承乾父子對待胡風的態度：前文所引《貞觀政要》李世民對隋煬帝過分介意胡人的例子中，李世民雖不過分介意胡、漢之別，但仍以正身修德為第一要務，所追求的依然是華夏傳統的為君之道；而李承乾卻以扮突厥可汗為快事，可見其對外來物品的追逐仰視態度。前者一直是作為明君典範，後者則被左右視之「以為妖」，再考慮前文所引《晉書》、《隋書》關於胡服胡風的批評，可知初唐時期胡風雖盛，但人們對於胡風也並非「追逐」而僅僅是「寬容」。正如葛曉音指出：

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華禮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確意識，並輔之以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從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來文明的同時，堅持以華化為主的基本傾向。⁴⁰

根據前文所引沙因的理論，初盛唐時期的胡風，主要體現在人工層面，從唐人對待胡人的華化等情況中可看出，其價值觀及其潛在的基本假設並無胡化。

上文中已論述了中晚唐時期，胡風服飾遭到士人的排斥的情形。與此同時，唐人對於「胡樂」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如推崇白居易樂府詩〈法曲〉⁴¹為華夏之聲。從高宗至肅宗（李亨，711-762，756-762 在位）年間，華夏正聲與胡樂不曾混雜，大唐也呈現出政通人和的盛世景象，而天寶末年，法曲與胡聲合作，第二年便爆發了安史之亂。雖

³⁸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80〈太宗諸子傳〉，頁 3564-3565。

³⁹ 《新唐書·于志寧傳》載：「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見（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104〈于志寧傳〉，頁 404。又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78〈于志寧傳〉，頁 2694。

⁴⁰ 葛曉音：〈論唐前期文明華化的主導傾向——從各族文化的交流對初盛唐詩的影響談起〉，《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頁 131-146。

⁴¹ 全詩如下：「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餘慶。永徽之人舞而詠，（永徽之時，有貞觀之遺風，故高宗製〈一戎大定〉樂曲也。）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霓裳羽衣曲〉起於開元，盛於天寶也。）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中宗肅宗復鴻業，唐祚中興萬萬葉。（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貞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明年冬，而安祿山反也。）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與政通。一從胡曲相參錯，不辨興衰與哀樂。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見謝思煒撰：《白居易詩集校注》，第 1 冊，頁 283-284。

〈法曲〉一詩與史實並不相合，但白氏此詩依然可以表明白氏認為音樂與政和、政失相關聯——胡音摻入本為華風的法曲之中，則興衰哀樂不辨；華音不正，則天下不安。

然而安史之亂後並非所有詩人對胡風胡俗都採取了排斥防範的態度，如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一詩描述了身着虛頂蕃帽、小袖胡衫的胡兒憑藉高超的舞技引得四座瞠目的場景，⁴²人們對中丞宅中夜舞胡騰一事並無反感。考劉言史、王武俊生平，他們生活在河朔一帶。⁴³中晚唐時期，河北與長安洛陽無論在行政、軍事、文化上都呈現出了很大的不同。《新唐書·藩鎮魏博》載，763年後，河北之地相對中央保持了較大的獨立性，⁴⁴故其文化風俗也與長安洛陽有極大不同。河朔之地本就是漢、胡雜居，安史之亂後，唐人出現了排胡現象，河北節鎮卻對胡人採取了優容的態度，使得「大量粟特人遷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傾向」。⁴⁵此時河朔之地胡風之盛，已不僅是服飾等淺層次的文化，較深的意識形態層次亦與中原有所不同。

中晚唐時期，士人對於胡風有了排斥之心，但當他們懷念開元天寶的盛世時，來自異域的奇珍也成為了這美好歲月的組成部分。如謝弗（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1991）所說，9世紀時，真實的外來異寶已經很難到達唐朝境內，「在貿易品方面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在9世紀時被文學作品中對外來物品的誇張描寫所取代了」。⁴⁶文學作品中記載的異邦進貢的珍寶並不一定真實存在，但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國力日漸衰弱的9世紀唐人對開元天寶時期為代表的處於盛世的唐朝的想像：各國進貢的珍寶紛至沓來，外來物品成了大唐盛世的一部分。

中晚唐時，士人對胡風影響下的女子服飾妝容呈現出排斥的態度，然而在構建盛唐景象時，來自異邦的貢品卻屢屢出現。考兩者之不同，前者是「華夏」漸漸被「夷狄」

⁴² 全詩如下：「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氎細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戰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遍頭促。亂騰新毳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見傅正谷選釋：《唐代音樂舞蹈雜技詩選釋》（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頁206-207。

⁴³ 《唐才子傳》有關於劉言史的記載：「（劉）言史，趙州人也。……與李賀、孟郊同時為友。冀鎮節度使王武俊頗好詞藝，言史造之，特加敬異。」知劉言史為趙州人，趙州地處河北，詩題自注曰：「王中丞武俊也」，《唐才子傳》也記載了冀鎮節度使王武俊對他的重視。冀鎮也處於遠離長安的河朔一帶。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卷4〈劉言史〉，頁72。關於王武俊，《新唐書·藩鎮鎮冀》載「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寶應初……奏兼禦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德宗擢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興元元年……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瑯邪郡王。」根據這些記載知，王武俊本出生少數民族，唐代宗寶應年間「奏兼禦史中丞，封維川郡王」，之後其活動軌跡一直在河朔一帶。參（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12〈藩鎮鎮冀傳〉，頁5951-5954。

⁴⁴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10〈藩鎮魏博傳〉，頁5921。

⁴⁵ 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載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2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102-123。

⁴⁶ 〔美〕謝弗（Edward Hetzel Schafer）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59。

侵染，雖然這種「侵染」僅僅處在一個較為淺顯的層次上，但已經足以引起士人對「以夷變夏」的擔心，而後者，作為貢品的奇珍代表的是異邦的臣服，它們不會影響到大唐的安全，反而是國力強盛的絕佳證明。

（二）女性地位

初盛唐時期流行的袒胸式襦裙、女着男裝等受胡風影響的服飾，只有在女性受到的束縛較少時才可能被接納。初唐女性地位確實較高：從婚姻觀念看，《舊唐書·列女傳》就記載了夏侯氏主動離婚之事；⁴⁷同時也有民間女子改嫁的記載，如唐太宗時期衛無忌母。⁴⁸

唐代初期，女性的政治參與度也較高，唐高祖女、娘子軍首領平陽公主（?-623）即以軍禮下葬，太宗長孫皇后（601-636）、徐惠妃（627-650）都有進諫的記載，至於武后更是以女兒身登皇位。

初唐女性地位與周邊少數民族影響有一定關聯：唐皇室本有鮮卑血緣，對於鮮卑婚俗，《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記載了鮮卑媒會婚俗：「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⁴⁹類似習俗亦見於突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⁵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初盛唐時期對婦女的束縛雖然較少，但男權社會的本質並無動搖，如孫機所說，男裝仕女地位甚至不如裙裝仕女，更談不上挑戰男權社會。⁵¹長孫皇后雖對太宗多有進諫，但《新唐書》亦記載她「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⁵²

唐代中後期，女着男裝現象逐漸消失，胡風服飾也不復興盛，正對應着中晚唐女性地位的下降。中晚唐時期，在思想意識上，士人重新重視儒學，而「基於儒學對綱常人倫的強調，必然會促使唐代中後期的社會對婦女貞節、家庭關係等問題進行重新認識」。⁵³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雖有 30 人，然而中唐之後，這種現象逐漸減少，唐憲宗

⁴⁷ 詳細記載如下：「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3〈列女傳〉，頁 5143。

⁴⁸ 詳細記載如下：「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3〈列女傳〉，頁 5141。

⁴⁹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90〈烏桓鮮卑列傳〉，頁 2985。

⁵⁰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 50〈異域傳下〉，頁 910。又參鄭師許：〈漢唐時代四裔民族之婦女地位〉，載李又甯、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61-80。

⁵¹ 孫機：〈唐代之女子着男裝與胡服〉，《藝術設計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27。

⁵²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76〈後妃傳上〉，頁 3470。

⁵³ 孫玉榮：〈唐代婦女地位的變遷〉（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頁 61。

（李純，778-820，805-820 在位）之後再無再嫁者。由此可見，中晚唐時期，社會對貞節觀念更為重視。

（三）思想、軍事方面因素

唐代女裝胡風興衰背後，除了上述直接原因外，更包含了根植於唐代思想文化背景之中的深層因素。

初唐朝儒學雖有復興，但是整體思想卻承襲了魏晉六朝儒釋道三教鼎立的情況。唐代前期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文化融合高潮時期，統治者在文化方面採取開放的態度，兼以此時國力強盛，足以兼收並蓄各種文化。因此，三教之間大體是共存共榮的。⁵⁴此背景下，儒學雖重視夷夏之防、男女之別，但此時儒家並非一家獨大，初唐可以容許較為興盛的胡風和較高的女性地位。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下降，朝廷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此時急需一個加強思想統一的工具，於是士人紛紛求助於儒學。如李絳（764-830）〈請崇國學疏〉便以沒有尊崇儒學為當時變亂的原因。⁵⁵

755 年，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唐朝國力下降，出現了諸般社會危機：藩鎮割據、中央權威下降、宦官專權、朋黨相爭、土地兼併加重、農民流亡、財政拮据等等。比較一下開元二十九年（741）與元和十五年（820）的唐代疆域圖便可知，安史之亂後，唐朝失去了西北的大片疆域。⁵⁶事實上，安史之亂的隱患早在初唐年間便已埋下。

下面根據《中國戰爭史》（武國卿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中國歷代戰爭史》（《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歷代戰爭史修訂委員會、三軍大學》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6-1980）、《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中國邊疆經略史》（馬大正著，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等整理出唐代部分對外戰爭：

時間	戰役	方向	結果
630 年	唐擊東突厥	西北	征服東突厥，將西起陰山、北至大漠的廣大地域收入版圖
635 年	唐擊吐谷渾	西北	舉國向唐降服
638 年	唐擊吐蕃松州之戰	西南	擊敗吐蕃軍

⁵⁴ 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05-106。

⁵⁵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第 3 部第 3 冊，頁 7278-7279。

⁵⁶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5 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頁 34-37。

640年	唐擊高昌之戰	西北	高昌王以城降，唐軍連續攻佔高昌附近 22 城，劃其地為西州
642-657	唐擊西突厥	西北	完成統一西域使命，並將勢力範圍推向中亞和西亞，直達裏海之濱
644-688	唐五征高句麗	東北	殲滅高麗，統一中國東北
670	唐擊吐蕃大非川之戰	西	唐軍慘敗，吐谷渾故地為吐蕃佔有
676-678	唐攻吐蕃青海之戰	西	唐軍敗。
692	唐擊吐蕃恢復西域四鎮之戰	西	唐重新攻奪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
700	唐擊吐蕃武街之戰	西	唐收復九曲之地
726-安史之亂後	唐與吐蕃河西、隴右地區長期爭奪戰	西	安史之亂後，吐蕃連連攻陷唐之城池，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節度使所轄之地皆被吐蕃占去
763年	唐反擊吐蕃長安之戰	長安	吐蕃停留長安 13 天
786年	唐反擊吐蕃汧城之戰	西	吐蕃兵退走
801年	唐反擊吐蕃雅州之戰	西南	唐大破吐蕃於雅州，但維州、昆明久攻不下。

表 2 唐代部分對外戰爭

由上表可知，在對外戰爭方面，太宗、高宗早期，軍事上呈現擴張局勢。在此背景下，唐太宗時期對外來文化有着高度的自信，可以毫無障礙地接受外來之物。唐高宗年間對吐蕃的戰事失利後，唐朝前期的軍事戰略受阻，「這標誌着唐朝的攻勢戰略的結束，唐朝以行軍為特徵的軍事進攻逐漸地轉向防守」，⁵⁷然而此時唐與吐蕃交戰地區僅局限於青海等遠離長安的地區，長安士庶並沒有直接感受到大唐軍事上受到的挫折，因此，長安城中，胡風仍盛。在與吐蕃的戰事失利後，唐朝軍事格局也作出相應的調整，

⁵⁷ 李鴻賓：《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係——以北方區域為線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135。

逐漸形成節度使制度，國家對軍隊的控制權從中央王朝轉入節度使將領手中。初唐時期胡漢分別較弱，唐朝節度使軍隊由胡、漢兩系組成，這種胡、漢雜用的體制為安祿山利用，導致內部出現大規模叛亂。⁵⁸雖然安史之亂本質上是地方與中央的矛盾而非對外戰爭失利，但在唐人眼中安、史是地道的胡人。而安史之亂後隴右等地喪失，導致關中暴露，嗣後更是發生京城淪陷的事情。中晚唐時期，唐與吐蕃邊境距離長安城僅五百里，唐人面對的不僅僅是故地喪失國威不復的哀歎，更是實實在在的威脅。在此背景下，唐朝士人自然喪失了初唐時期的自信，並對婦女所着胡風服飾產生排斥之心。而安史之亂時，唐朝曾借助回鶻兵平亂；安史之亂後，唐與吐蕃疆域接近。這也是中晚唐流行的胡風服飾主要受到回鶻、吐蕃影響的原因。

六、結論

初盛唐時期女性服飾中的胡風主要體現在窄衣小袖、袒領、女着男裝上，且日漸興盛。安史之亂後，胡風影響減弱，仍存的胡風服飾主要受到吐蕃和回鶻的影響，蓋因為前者疆域離大唐首都已經不遠，而後者則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亂時借助的對象。

女性胡風服飾興衰背後，是唐朝文化深層次因素的影響。初盛唐時期婦女胡風和男裝盛行背後，固然有女性地位相對較高、文化上對外開放的因素，然而其背後的實質並非打破華夷天下觀或突破男權社會，而是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處於上升時期、優勢地位的唐人自信下的寬容。這種自信建立在初盛唐繁盛的基礎之上，當安史之亂如平地驚雷般打破了盛世大唐的美夢後，初唐時期的自信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帶有恐懼意味的保守，於是京洛士人表現出排外之思想，女性地位下降，胡風服飾便遭到排斥，而女着男裝幾乎消失不見。

⁵⁸ 李鴻賓：《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係——以北方區域為線索》，頁 137-139。